

# 田野工作挖掘真相

劉雅靈

國立政治大學

社會學系副教授

在社會科學中不論採用問卷調查的量化研究或田野工作的深入訪談，研究者均面臨方法論科學實證要求的考驗，必須確認所蒐集資料的真實性--效度與信度。在中國研究領域中，原始資料蒐集所面臨的真實性挑戰特別大，重要原因在於截至目前為止，中國仍然缺乏言論自由與民主法治的人權保障，而且台海之間的政治緊張與敵對，更使中國研究的原始資料蒐集困難加重，更遑論資料內容的真實性。

回想早年(1987年)在溫州做農民私營企業發展的研究時，原始資料真實性問題成為田野工作者的困擾之一。溫州私營經濟發展是我的博士論文題目，主要探索地方政府所採取的治理政策，如何扶持溫州私營經濟發展，導致農民自發的私營經濟不僅在溫州居主導地位，而且領先全中國。

1987年抵達溫州之前，我對溫州私營經濟發展的瞭解，來自當時既有文獻的參考與閱讀，認為溫州農民家庭企業與工廠的興起，均始於1978年改革之後，但這與日後田野考察所得截然相反。在正式田野工作開展之前，我曾在浙江社科院幾位學者陪同下，以兩星期左右時間將溫州從北至南走過一遍，對溫州整體發展有了大致瞭解後，才正式選定南、北各一個農村地區作為田野地點。當時溫州市政府對外來學術調查者採限制態度，許多窮困農村不得進入，再加上那時大陸學術界對溫州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爭論不休，導致我的田野調查時間被迫緊縮，並限制農村活動範圍。由於我選擇的田野地點皆無旅店，或不適合我的境外身份，溫州市政府外事辦公室負責把我送去當地後，便安置在當地幹部家中暫住，就近監視。

在第一個田野地點與當地鄉鎮幹部的訪談中，包括鎮委書記、副書記、鄉鎮企業管理站站長、工商局幹部、農技站站長等，均一一告知當地農民家庭作坊與小工廠均在1978年之後興起，雖然有幹部曾提到溫州在毛時期的發展歷史，尤其在50年代與60年代曾因短暫發展「分田單幹」與家庭個體經營而遭政治整肅與打擊，但自此之後，溫州便嚴守中央政策走向集體農業，壓制個體經營。而且在個體經營被強制除根之後，溫州經濟即被集體農業鎖住，一蹶不振，直到經濟改革，允許個體經濟發展，溫州經濟才開始扭轉，並在地方政府善意支持下迅速成長。

從鄉鎮幹部口中得到溫州私營經濟發展的圖像，與後來個別農民訪談得到的故事是不一樣的。在大陸的田野調查中，如何得到真實答案而不被政治口號所掩蓋是相當困難的。如訪問農民個體戶與企業家，一定都有地方幹部陪同，往往受訪者在幹部現場的震懾下，多不敢暢所欲言，甚至害怕所吐真言，日後成為政治把柄遭受迫害，故多以政府政策為替代答案，

明哲保身，而研究者往往因得不到真實回答而暗自叫苦。由於當時我住在地方幹部家中，日常生活自由度受到限制，四方鄰居村民多不敢前來造訪，甚至不敢與我在厝旁路邊交談，而且他們事先已被村、鎮幹部告知不得隨便與我談話，以致我的田野工作孤獨無助，隔離大眾，備受官方限制。

爲突破政治藩籬，研究者必須在田野地點設法擺脫幹部陪同所帶來的政治困擾。我曾嘗試與陪同幹部溝通，請他不必作陪，讓我獨自前往農民家中訪問，但是屢遭拒絕。然而有一次因陪同幹部忙碌，遂指派其他幹部陪我前往調查，而此一幹部對監督我調查訪問的興趣明顯差一截，往往在我訪談當中離席外出透氣，這就成爲我把握時機探索真相的時候。溫州農民也相當機靈，也就在幹部缺席之時，告訴我剛才幹部在場所言不必當真，因爲幹部都已事先交代他們只能說好話給我聽，因此他們許多話是說給現場幹部聽的，而不是回答我的問題。故當幹部不在場之際，才真正開始回答我的問題。有此經驗之後，我遂要求主事幹部改派其它小幹部或女幹部陪我去作訪問，降低訪談中的政治困擾，以便我能獲得地方發展的真相。

從溫州農民斷斷續續的口述中，我逐漸拼湊出溫州發展的形貌。根據他們的敘述，溫州個體經營的家庭工廠與小作坊遠在1978年改革之前就一直存在，有些農民早在60年代初就經營地下工廠，累積相當豐富的做生意經驗。有些農民坦白承認在文革期間溫州國營企業被迫停工之際，他們就將部分生產承包下來，帶回農村家中進行代工。有些農民甚至外出，從事產品推銷，賺取產品差價。而且這些農民供銷員是得到公社允許，與公社發放的集體供銷員執照外出經商，他們與傳統商人一樣，到農村中挨家挨戶收購產品，以集體工廠名義銷售到外地。從農民口中得知，溫州個體私營經濟早在改革之前就普遍存在，而且融入農民日常生活，成爲重要的經濟收入補充。農民口中描述的溫州私營經濟發展，與幹部告知個體私營被強制除根而走向農業集體的圖像，相距太遠。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，何者爲真？對中國政治社會有所理解的人，當然知道官方一向追求「政治正確」，企圖掩飾真相，甚至假造虛構，謊情上報。

在中國研究中挖掘真相成爲研究者最大樂趣，然而官方阻撓與受訪者因政治顧忌不願正面回答，成爲真相挖掘的障礙。解決障礙方法之一是想辦法減少幹部的陪同。其次是延長田野時間，與受訪者熟識，結交朋友，取得他們的信任，降低他們對陌生人訪問的防衛。其實這是所有田野工作的鐵律，不限於中國大陸。回想當初溫州田野經驗，鑑於第一個田野地點有無幹部陪同造成訪談結果的差異，遂特別用心經營與第二個田野地點陪同幹部及當地村民的關係。在初始前幾天幹部仍然全程陪同，而且每天聽我陳述相同問題，倍感煩瑣，因此在我努力勸說下，他終於在最後幾天軟化，放手讓我一人前往村中的個體工廠與農戶企業訪問。自此，我從農民口中得到溫州私營經濟發展的圖像更爲清楚。個體經營的發展，在第二個村落小商品生產中重演，不僅在毛時期就已打下基礎，甚至地方幹部不願執行上級政策打壓農戶的小商品生產。爲何地方幹部如此縱容農民家庭工廠與地下經營？難道幹部不怕一旦上級查出，不僅烏紗帽難保，可能還會遭到嚴懲與整肅？然而地方農民卻說，幹部當然清楚

一般農民在家的經營生計，不僅如此，幹部家屬也同樣加入個體經營，幹得轟轟烈烈更為積極，因為幹部享有政治特權，藉特權經營比普通農民賺得更多。過去如此，80年代也如此。果然，在我借住的幹部家中，晚間飯後常有鄉鎮政府其他部門幹部前來閒聊，雖然限於溫州方言，不知所云，但經由與隔壁村民的日漸熟識與閒聊，得知這些幹部利用晚上時間來談生意。他們投資鎮經營的供銷社，做物資倒賣生意，大賺其錢。因此，我的結論是：由於幹部與農民在個體經營中的利益是一致的，他們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消極放任農民的個體經營，以便從中獲得更大利益。因此，一旦改革開始，早已經營有年的溫州民間地下工廠與企業，便於一夕之間冒出地面，欣欣向榮，導致溫州的私營經濟發展領先全中國各地。因此溫州私營經濟不是改革之後的新生事物，而是早先的歷史制度遺緒。

最令我好奇的是，溫州的幹部從50年代起，因背離中央政策，遭受許多重大血腥整肅與衝擊，割除「資本主義尾巴」，但為何溫州的私營經濟仍然呈現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？而且根據文獻資料，溫州R縣某村曾在改革前的十幾年內被上級派駐工作組十三次進行整肅，為何這些幹部如此大膽抗拒中央政策，寧願犧牲個人政治前途，偏袒個體經營的地方利益？

被此問題困擾之際，我回憶起在溫州南部山區曾見過當地共黨游擊隊抗日犧牲的紀念碑，顯然溫州共黨組織發展甚早，而且擁有軍事武力，自行發展地下游擊隊，這在抗日時期的中國南方是少見的。根據此一田野線索，遂於日後開始圖書館文獻資料閱讀，尋找有關抗日戰爭前後中國紅軍發展歷史與解放軍將領傳記，果然從文獻中發現溫州特殊的「解放」歷史。原來早在共產黨從江西瑞金北上長征延安之際，有紅軍與毛理念不和，其中一支流竄到浙江南部，便與溫州共產黨結合，成為地方游擊隊。雖然這支游擊隊後來在抗戰期間北上參加新四軍，但部分人員留下成為溫州地方黨的主幹。這批黨員遠離延安，不但未接受延安指揮，而且為求生存，獲得地方資源與支持，採因地制宜策略。例如溫州自清末開埠以來，貿易通商發達，農村副業興盛，以致地下黨難以在溫州平原地區推行財產公有的社會主義政策，更遑論實行土地改革。為與地方國民黨競爭，溫州地下黨甚至與當地資本家及地主合作，共同經營山區木材生意，取得地方菁英份子的好感與支持。因此溫州地下黨自始為適應地方，擴大生存機會，奠定與資本家合作的基礎。這也是為什麼日後溫州在毛統治時期，一直不熱心推行中央政府的社會主義集體改造政策，反而同情農民的分田單幹與地方私營經濟。

田野調查與文獻研究結合，逐漸解開我對溫州幹部行為的困惑。溫州地下黨為求生存與現實妥協，不僅與延安關係不深，而且在經濟政策上同情資本主義，溫州儼然為延安之外的獨立王國，自成一派。當1949年共軍三野渡江南下之際，溫州地下黨就已經靠自身游擊隊力量，策動國民黨投降而奪取溫州地方政權，達到自我解放。當三野二十一軍抵達溫州之前，溫州地下黨早就接收並掌握地方政權，為阻擋二十一軍奪權，兩者之間還發生嚴重衝突。由此可知溫州的叛逆與獨立自主其來有自，浙江日後為剷除地方山頭主義，曾數度整肅溫州幹部，並以北方南下幹部取而代之，但縣以下的公社基層幹部仍掌握在溫州地下黨手中，成為地方抗拒中央的主力。由此可以解釋為何溫州基層幹部歷經多次政治打擊與整肅，資本主義

式的個體經營依然故我難以動搖，使溫州成為改革之後中國資本主義的大本營。

田野工作的資料蒐集是挖掘真相，取其信度與效度。然而真相的呈現除靠當時當地的調查訪問資料外，研究者必須瞭解，現今的發展是先前歷史與制度的遺產，任何現象都具有路徑依附(path dependence)性質。因此，結合田野調查與歷史探索，成為挖掘真相的利器。